

广州市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管理处
十九路军淞沪抗日将属广州联谊会



1888-2008

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将军 诞辰120周年纪念专刊



蒋光鼎将军（1888~1967）

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将军 诞辰 120 周年纪念专刊

编 委 会

主 编

黄萼辉 (原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副主编

罗淑欣

顾 问

陈进才 柳树林 苏跃文

编 委

蔡醒民 苏 舫 李晶如 李素欢 沈旭华

吴智红 张华安 冯建勋

装帧设计: 壹沁

印 刷: 广州市千彩纸品印刷有限公司

内部发行



编者的话

今年是爱国将军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将军诞辰 120 周年。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编辑这本刊物，既以纪念蒋光鼐将军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丰功伟绩，同时也让年青一代更多地了解革命前辈为祖国富强，人民幸福奋斗终生，为探索和坚持中国人民应走的道路付出毕生精力，历千艰万险而百折不挠的伟大精神。

蒋光鼐将军是一位有勇有谋的指挥官。在战场上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是一个忠厚仁爱的长者，热心公益，对社会上的医疗、教育等事业无不尽力支持；他秉性和善、待人以礼。这许多优秀品德，都为我们作出榜样。我们纪念蒋光鼐将军，应该真诚地向他学习。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



目 录

一、诚挚的怀念

- 002 纪念蒋光鼐诞辰 120 周年
——深切怀念蒋光鼐伯公 蔡醒民
- 006 悲痛中的欣慰 蒋建国
- 010 追忆蒋光鼐先生 朱乃正
- 013 深切怀念蒋光鼐先生 李诵仪
- 017 无以回报的悲哀 蒋定苏
- 024 爸爸对我的关爱 蒋定日
- 029 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 蒋定桂
- 037 永遇乐——怀念蒋光鼐将军 潘铭萱
- 038 缅怀抗日名将蒋光鼐、蔡廷锴将军 苏些零

二、蒋光鼐光辉的一生

- 039 立志从军 追随孙中山闹革命
- 044 淞沪抗日 吹响全民抗战的号角
- 053 福建反蒋 联共抗日
- 061 对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的补充 蒋光鼐
- 073 毛泽东致蒋光鼐、蔡廷锴信
- 074 为新中国奋斗
- 080 热心公益 慷慨捐输
- 083 蒋光鼐生平大事年表简编

三、蒋光鼐故居、故友、家人

- 086 《乐安亭记》 孙堂发
- 087 “乐安亭”碑文考——蒋光鼐先祖溯源 蒋定穗

四、风范长存

- 102 蒋光鼐女儿蒋定桂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第一部分

诚挚的怀念



纪念蒋光鼐将军诞辰 120 周年

——深切怀念蒋光鼐伯公

蔡醒民

将军 1888 年 12 月出生于广东省东莞虎门镇南栅的一个书香世家。祖父蒋理祥是清朝进士，同治三年授翰林院编修。父亲蒋子敏是光绪年间举人，在北京景山官学任教。蒋光鼐却是职业军人，1906 年 18 岁时入读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并加入同盟会。1909 年毕业，升入南京第四陆军中学。他追随孙中山革命，参加了武昌起义，成为广东北伐军的排长、连长；1912 年保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骑兵科。孙中山组建粤军第一师时，他先后任师部参谋，警卫团附，警卫团连长、营长。

我的祖父蔡廷锴是蒋光鼐将军生死相交的战友，较蒋光鼐年青近四岁，他称蒋光鼐（字憬然）为“憬公”。而蒋光鼐则称我祖父为“贤初”（蔡廷锴字贤初），所以我称蒋光鼐为伯公。

我祖父与蒋光鼐的初次见面很有戏剧性，在我祖父的自传中有这样的记述：“1923 年底粤军第一师奉孙中山之命平定陈炯明叛乱后，第四团原团长陈铭枢，戴戟先后调离，第三营长缪培堃继任团长，所遗营长缺，我第四团官兵均向我预祝，以为必属于我，我任少校连长，且已立功三次，在当时同事中，尚无资深于我者，自己亦以为舍我莫属。怎知事实不然，所遗营长缺，上峰却向外物色，以蒋光鼐接充。一场热腔，顿作冰消，心极难过。自念在该部已有七年历史，冲锋陷阵，不下数十次，为本团本营立下不少功劳，且自己既为少校连长，升迁竟不及已，即使再继续下去，亦必无望。我虽深知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惟不平则鸣，若鸣则非走不可，自己心里有“朝里无人莫做官”之感，不免心灰意冷，遂决心辞。……转到补充团当连长去了……”但命运还是把他们安排在一起，不久在一次会议上他们相见了，蒋光鼐主动走到我祖父跟前握手。我祖父从蒋光鼐那亲切而坚毅的目光中，发觉此人是一个精明的指挥员，我祖父对上级不满情绪也渐渐消除了。1924 年秋天，蒋光鼐任粤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我祖父在该团任第一营营长，他们持续一生的深厚友谊从此开始了。

在军队中，他们是配合最好的上下级，在生活中他们是患难与共的兄弟。蒋光鼐的军事谋略，谦虚谨慎和我祖父机智骁勇、豪爽刚毅，几乎使他们之间



达到珠联璧合的程度。正因为他们这种智与勇，动与静的互补，使他们在以后的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中屡立战功。

他们共同参加北伐，又共同走过弯路，由于对蒋介石在北伐胜利的形势下叛变革命认识不足，他们参加过拥蒋的中原大战，后来又参加过对红军作战。在中原大战屡屡立功。1930年8月成立了十九路军，蒋光鼐任总指挥，我祖父任军长。

1932年“1·28”淞沪抗战，他们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为民族争气，为军人争人格，毅然违背政府旨意，率领十九路军抗击日本侵略者，33天内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从此光荣的十九路军被誉为抗日英雄的军队，蒋光鼐，蔡廷锴成为真正的民族英雄。

淞沪抗战后，他们因不满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共同参与李济深、陈铭枢发动的“闽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蒋介石政权分庭抗礼。“闽变”失败后，他们在香港与李济深、陈铭枢于1935年8月成立了新的抗日反蒋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他们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表示努力敦促各党派摒弃成见，立即缔结抗日救国联合阵线，实行全民族抗战。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

1937年，在全面抗战的形势下，在全国人民要求下，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调整政策，蒋光鼐与我祖父又可以回国参加抗战了，他们先后奔赴抗日前线。

我祖父的自传还有多处记述他与蒋光鼐的深厚情谊和高尚品格。1937年10月19日我祖父在南京遇到车祸，粉碎性骨折，先后转到武汉，又回到香港治疗，1938年10月转到香港玛丽医院，“那时蒋先生也因身体不适亦到该院休养，两人住隔邻房间。自蒋先生来留医，探诊的亲友此去彼来，有如过江之鲫。因为我与蒋先生患难与共廿多年，所有彼此亲友，大都相熟，是以来访我的必探蒋先生，看蒋先生的亦必来望我，接踵相继，无或有间，几使我忘却病痛，可算是数月来最安慰的时期。蒋先生住院四星期，已恢复健康，可以出院了。医院总是希望蒋先生早离医院，可是当蒋先生出院时，我确有点难过，情若不舍，因此我在医院又复孤寂了。”又有一处记述：“1943年3月11日接黎民任兄电话，谓蒋副长官光鼐已到（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并电其后方主任张静轩嘱舒勉斋转知，到美丽川菜馆会面，并食午饭。我与蒋先生隔别多年，忽得拜晤，心殊痛快。渠之环境，名义上较我为高，而权责不属亦不过系一虚衔。惟他素淡视名利，最高当局迭次征求其出执粤政，始终不允屈就，其人格之高尚，于此可见。蒋公专为白母（白崇禧母）马老太夫人祝寿而来，日期未到，甚为得闲。即往丽狮路十二集团办事处，与其消遣，终日谈天说地，虽在艰苦

困穷之中，亦极有兴趣”。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选择面前，蒋光鼐与我祖父已经历多次风浪的考验。他们坚定地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并积极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后来又共同参加了新中国的筹建工作。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是抗战胜利不久认识蒋光鼐伯公的，他与我祖父都是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领导人。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蒋伯公保留在国民党政府的军职，所以“民促”的一切活动，他都不会公开出席。后来我祖父被迫离开广州，蒋伯公常常单独到香港与我祖父会面详谈，有时还在我家住上几天。1948年8月我祖父作为第一批民主人士秘密前往东北解放区。蒋伯公则是留守香港主持民革中央机关工作负责人之一。他有时也在我家停留或小住，后来，我才知道他为了工作避免有人跟踪。因我当时只是个不满十岁的小孩子。1949年8月蒋伯公也离开香港，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的政协会议。

1950年，蒋伯公与我祖父被安排同住在北京东单沟沿头17号院内。新学年开学前我们两家的孩子都由香港来到北京，还共同就读一间学校。我与蒋伯公的长孙蒋思云是同班同学，两家人在一起就如同一个大家庭。两位老人对我们后辈的关心，爱护，使我们终身难忘。后来两家的其他孩子陆续从香港到北京，我们家先后搬到石碑胡同和前圆恩寺胡同。他们家因扩建北京火车站搬至大甜水井胡同。两家人的往来，并没有因住处分开而间断。直至现在我们两家亲属都仍有联系。

蒋伯公平易近人，慈祥和蔼，亲切。每年夏季蒋伯公与我祖父会到北戴河休假，两家又被安排相邻房子，我们有幸可去陪伴他们，除和他们打扑克牌，游泳外，都喜欢听他们讲述年青时的经历。蒋伯公对我讲过，读军校时，“因个子不高，就学习骑兵科，我能够两脚扣在马匹身上，卧在马肚下，双手还能开枪射击……”从他的谈话中可以想象他年青时矫健的身影。他鼓励我们说：“现在条件这么好，你们要学好知识，锻炼好身体，报效国家……”。他是我国首任纺织部长，负责全国人民的衣着。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布票定量供应。他知道我个子大，又是学地质的，常常要在野外工作，他问我的布票怎样分配使用。我说：“在野外不用讲究，穿旧衣服就可以了，即使破了补一下，再说学校还发我们一身工作服呢。”他听后说：“特殊工种是有工作服的，我们现在正研究用化学纤维作质料代替棉花，不久将来就能解决了……”告诉我们经济困难仅是暂时的。

1966年4月我祖父患病住了医院，我和妻子急忙请假回家探望，一出火车站就直奔医院。看见祖父身体还好。祖父对我们说：“我身体好多了，再休养几天就可回家了。你们到隔壁病房看望蒋伯公吧！他病较严重……看望他后我们再谈……。”我与妻子到了隔壁病房，蒋伯公卧在病床上，身体很衰弱，但精



神还好。我们问候他的病况，希望他早日康复。他却安慰我们不用挂心，又说这次又和你阿爷一齐住院了，平时工作忙，现在每天都有时间和他聊天，……他还问了我们工作的情况，要我们多注意身体……还说“你们请几天假不容易，这次多陪你阿爷几天吧！……”想不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蒋伯公了。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8月22日学生“红卫兵”冲到蒋伯公家“造反”，“破四旧”，并掠走了蒋伯公多年收藏的字画，印章。甚至蒋伯婆仅有的三万元存款（他们家人的生活并不宽裕）。身患癌症且刚做过手术需要静养的老人，被一群无知学生羞辱。后来我得知这些“红卫兵”离去后，蒋伯公莫名悲愤，将手中拐杖朝院中一盆盆花卉使劲劈去。他喘息着，愤怒使他浑身颤栗。患难中，蒋伯公首先想到关心我祖父，他立即请蒋伯婆给我继祖母打电话，唯恐我祖父脾气急躁，与“红卫兵”冲突起来要吃亏。不久蒋伯公癌症复发了。蒋伯公听说上海第二军医大附属医院能动手术，在当时“混乱”情况下，他给叶剑英元帅打了电话。叶帅很快作了批示。虽经过治疗，病情还是恶化了，并没有得到好转。不幸于1967年6月5日在北京病逝。我的祖父异常悲疼，在家哭了三天，心情难以平复。不到一年我的祖父也因病与世长辞。

两位老人家去世后不久，蒋伯婆黄晚霞与我继祖母罗西欧搬离原来的住所。安排到北京建国门外灵通观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宿舍，蒋家住906室，我们家住805室，两家人又住在一起了（8楼与9楼）。“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蒋伯婆黄晚霞与我继祖母罗西欧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广州沙河“十九路军陵园”有了管理处，陵园被省、市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又是国家、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最近又评为国家级3A旅游点及广州中共党员教育基地。我们蒋、蔡两家亲属向领导申请将老人家的骨灰由北京八宝山公墓迁回十九路军陵园得到批准。1997年12月，我们两家亲属将老人家的骨灰迁回陵园安放。陵园西侧还雕塑了两位老人家大型头像的浮雕墙。两位老人将永远在故乡重叙。

蒋光鼐将军与蔡廷锴将军离开我们四十多年了，他们一生走过一条曲折而又不断向前的道路。爱国爱家，无私奉献是他们共同的生活准则，他们对工作，对生活勇往直前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88年，作者摄于东莞蒋光鼐故居

▲ 蔡醒民——蔡廷锴将军长孙、
▲ 十九路军将属联谊会会长

二〇〇八年十月

悲痛中的欣慰

——先父蒋光鼐逝世前后的日子

蒋建国

1987 年 6 月 8 日，是先父蒋光鼐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怀念父亲，记得最真切的，当然是时间距离现在最近的，是他最后从患病到去世那一段的事。

几乎与“文革”开始的同时，父亲得了癌症；其时他内受绝症煎熬，外感浩劫冲击，处境的艰难可想而知。然而，当这些就像昨天刚刚发生过的事清晰地脑海中浮现时，我们的心中波涛汹涌，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怀由衷的感激，胜过了失去亲人的悲痛之情。

1966 年炎热的夏天，刚刚做完手术在家中修养的父亲，接到了于 8 月 18 日陪同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邀请。由于身体虚弱，他没有去。那时候，人们已习惯于从报纸上的名单变化去看政治气候，谁的名字见报，谁的名字没见报，等于谁没问题，谁有问题。这一简单的“公式”，父亲不会不懂，一生淡泊功名的他，不勉强自己去，也是自然的。

8 月 27 日中午，传达室老祝从大门上的观察孔看到，叫门的是一群女八中的红卫兵，连忙到后院向我父亲请示是否开门。父亲说：“欢迎红卫兵来嘛！”她们冲进来后，叫全家人集中在客厅，然后宣读“告民主党派最后通牒”，通篇是一连串的辱骂……父亲坐在沙发上，手里紧握着那根千年藤拐杖，自始至终一言不发。那些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并不清楚，在她们面前的这个干瘦矮小的老人，就是当年在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时，领导十九路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总指挥，淞沪抗战的最高指挥官，曾经被誉为抗日将军、民族英雄。他的画像曾被爱国学生在游行时高擎着前进，他的肖像曾悬挂于陕北红军俱乐部的墙壁上。1933 年 10 月，父亲与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同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又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签订了停战协定，父亲与蔡廷锴从此逐步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那些十七八岁的女学生更不知道，父亲像她们这般年纪的时候，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几十年来，他在黑暗的旧社会摸索，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并最终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途径。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他是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常务委员；从1952年起，他担任纺织工业部的部长，十几年来为解决几亿人的穿衣问题而不遗余力。

红卫兵们带走了所有她们认为是“四旧”而又值钱的东西，并扬言第二天还要派三辆卡车来拉东西。红卫兵走后，父亲第一件想起要做的事，就是给蔡廷锴挂电话，叮嘱他万一小将们去了，千万别发火，因为几十年的交往使他深知蔡将军的脾气。

当晚，纺织工业部的“红卫兵”进驻我家。据说这是部里得知我家被抄的消息后，紧急成立起来的，以进驻接管为名，行保护之实。

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金城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周总理在1966年8月底的一天，写了一个应予保护的党外高级干部的名单、范围、原则和具体办法的文件，在总理亲笔书写的十二人的名单中就有蒋光鼐的名字。当金城接到这个文件的时候，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正在挨斗，但中央领导同志对我父亲却尽力采取了保护措施。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在友人再三的劝说动员下，父亲拄着拐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周总理从很远的地方看见了他，就走过来和他握手，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后问道：“听说红卫兵去过你家了？”他答：“来过了，不过还斯文。”（广东话“斯文”即文明、有礼貌的意思。）

1966年底，父亲的癌症复发了，继发的病灶位于通过肝脏的总胆管内。曾参加会诊的日坛医院院长吴桓兴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可以做这项手术，他们的技术当时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我们将吴院长的意见转告父亲，他沉思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道：“童小鹏、周荣鑫都不在总理身边了，找谁呢？”忽然，他想起了什么，从床头柜找出一个小电话本，让我给叶剑英挂电话。他用广东话和叶帅互相问候，亲切交谈，很快就谈妥了转沪治病的事；写给叶帅的信送出后，有叶帅批示的信件马上就送了回来。我好奇地问父亲：“以前你和叶帅熟吗？”他说：“1925年东征打陈炯明的时候，我们曾经并肩作战。”（当时叶任第二师参谋长，父亲任第一师第一旅第二团团团长。）

父亲出院前的那天，正好是“一·二八”三十五周年纪念日。晚上，我和妹妹围坐在病床边，希望听父亲讲讲三十五年前发生的事。他说：“是啊，三十五年前的今天我也在上海，那时候，我也是在住医院，一听到枪声，我就马上赶回指挥部。”

关于这一细节，有历史学家在书中曾作过如下的描述：“总指挥蒋光鼐自蒋介石发动对红军的‘围剿’起，就一直养病就医，屡征不出；这次抗战，一接到戴戟电话，就立即驱车赶至司令部坐镇指挥。”（见王顺生、杨大伟著《福

建事变》第十八页)但我们从未听父亲谈及。

我们还从史书上看到:1932年1月28日夜11时许,日本海军陆战队悍然向我上海闸北驻军发动进攻,十九路军官兵奋起抵抗。十九路军作为中国的正规军队,打响了自甲午年以来抵抗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枪!在一个多月里,曾使气焰嚣张的侵略军三次增兵,三易主帅!我们想,除了曾被各种报纸、杂志、书籍大量报道过的基本事实外,还有多少未为人知的内幕、细节可谈啊,可是,父亲却闭口不谈——在“文革”中,过去的事有什么可说的呢,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父亲在病危期间曾对我们说:“周总理讲过,有一张以前和我合影的照片,以后请人找出送给我。”今年3月,在民族文化宫展览馆举行的童小鹏摄影展览会上,我看到一张周恩来同志与我父亲在1939年合影于重庆曾家岩渔村的照片。周总理说的就是指这一张吧?在“民革”中央秘书处的帮助下,我有幸与童小鹏同志联系上了,他慨然答允送我一张这幅照片,我们将永远珍藏留作纪念。

父亲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一次,在北京医院的走廊里,纺织工业部的徐秘书拿着悼词草稿征求我们家属的意见,同时向我透露:接到医院的病危通知后,部里即打了一份报告,向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请示后事如何料理,因为“文革”开始以后,这是第一个党外的部长级干部逝世,谁也拿不准该怎么搞。二十四小时过去了,没有回音,再派人去查询,结果在王力的抽屉底把那份报告找了出来,只得撤回呈报周总理。总理当即具体指示,悼词有四个重点:一、早年参加同盟会,跟随孙中山闹革命;二、领导“一·二八”抗战;三、福建人民政府的联共、反蒋、抗日活动;四、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上四点是对父亲一生经历的高度概括。原先悼词草稿中有“在工作中识大体顾大局”等语,周总理说,那都是枝节问题,可以不必写了。

周总理对参加追悼会的名单也作了具体指示,若非总理亲自点名,有的人恐怕是难以出席的。

1967年6月8日下午四时四十分,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因为有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与具体指示,后事料理得有条不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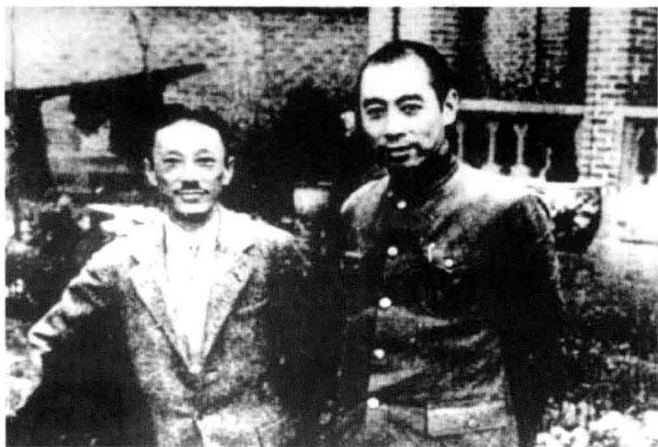
父亲逝世后的第四天,6月12日上午,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礼堂举行。会前,谁也难以预料这个会将开成什么样子,当时纺织工业部两派群众的斗争激烈,两派之争的大标语已刷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的围墙上,召开数百人参加的追悼会,群众会不会趁机闹事?我们的心头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当我们全体家属列队站在会场内左侧时,环顾四周那空空荡荡的长方形房子,只



有前方骨灰盒下面放着一个我们自己供的鲜花篮；群众代表站在会场门外，他们都在安静地等待着。我们心中开始忐忑不安，时间过了，为什么还不开会？终于，边门开了，第一个进来的是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跟随在后……这时，我们心上的石头落了地，心头蒙上的那层阴影散开了，觉得整个会场顿时明亮起来，欣慰胜过了悲伤，心中充满了对周总理等领导人的感激之情。

追悼会由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陈维稷主持，他等到周总理站好，就宣布追悼会开始。周总理回头看了看，马上小声而严肃地制止道：“等一下，蔡还没进来。”日理万机的总理，每天都要处理许多重大的事情，却仍注意到了种种细枝末节，他深知，蒋光鼐和蔡廷锴的名字是连在一起被载入史册的。

周总理在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钱之光致悼词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前面地上那唯一的花篮。事后，徐秘书告诉我们：周总理生气了！追悼会结束后，周总理严厉地批评组织者说：连花圈都不送，太不像话！



1939年蒋光鼐和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合影

虽然周总理等领导人参加了父亲的追悼会，第二天却没见到任何一家报纸作报道，一直到1967年7月2日，《人民日报》才在外贸部长叶季壮追

悼会消息的后面补发了报道，但未加标题。我们被告知，也是周总理发现我父亲的追悼会没发消息时，在他表示关注以后才补登的。

父亲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第一室。他去世后，我们均得到组织的照顾和关怀。匆匆二十年过去了，我们每当回想起父亲去世前后的那些日子，便不禁由衷地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地贯彻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我们对此将永远铭记于心。

原载《团结报》1987年6月

追忆蒋光鼐

朱乃正

人过花甲，忙里闲中，不时会忆起往昔岁月，常常是人或事交迭出现，由零星、片段开始，互相引发，逐渐组合成一个较完整的回溯。籍此可以重温许多经历，不论当时是乐是苦、是悲是喜，但凡在回忆过程中，你愈能体味生活道路的曲折变化，人生的充实与丰富，从而感到一种慰念：因为，这些都是你独自拥有的。这里，我要述说的是蒋光鼐先生。人们或许会十分诧异。论我的年龄、籍贯、家庭、职业、经历，怎能与一位近代史上的人物，赫赫有名的抗日将领有关连？而世上事物之奇缘巧遇，亦正在于斯。

由于我和蒋光鼐先生之子蒋建国是同龄人，早在 1951 年高中时期就交识，他在北京市第 26 中学，我是第 24 中学，都爱好绘画，所以同时被学校送至北京市业余艺术学校美术系学画，每个星期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见晤。1953 年同期考入中央美术学院，过往甚密。而于 1957 年的政治风云中同遭不测，1959 年春又同时发放至西北高原，彼在陇上，我去西海头。在那里坎坎坷坷度过了廿载春秋。最后，又相继于 79、80 年回归京城。这同样的年岁、同样的命运，虽分在甘、青两地，彼此从未中断来往，这深厚的友情，是经过整整半个世纪人生沧桑铸就的莫逆之交。因此，使我常有机会到他家去聚叙。有幸拜识了建国兄的父母，我执晚辈礼，尊称为蒋伯伯蒋伯母。那时，光鼐先生已担任国家纺织工业部部长，公务繁忙，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投入全部心力，当我第一次见到时，已经很难看到一个当年身着戎装的名将威仪，而是一位平和详霭的长者，反而有一种文质彬彬的儒雅风采，仅在眉宇之间，仍隐隐然留存着当年戎马生涯中战火硝烟的印迹。尤其在和家人诸多子女一起时，更有全家在他周围融合无间的亲情温馨。

印象最深的是 1964 年春天。我在青海创作的油画《金色季节》，正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全国公社风光》美展中展出，我从上海探亲之后到北京看展览，刚巧建国也在北京探家。蒙建国兄厚意，让我在他家下榻，在短短数日中，我得到全家的善待，与诸弟妹不羁地论事谈艺，渐更熟悉热络，使我感受到近乎手足之情。蒋光鼐先生和我们一起用餐，一起看电视（那时国内刚有黑



白电视)，还一起到政协礼堂看电影，我就像是他们家庭中的一员。

蒋光鼐先生无甚嗜好，惟好收集石章，家中收藏甚丰。记得客厅中还置一张乒乓球桌，闲暇时还和儿女们对打一阵。在短短几天中，受建国之命，要我给光鼐先生画一幅油画肖像，当然要抽用蒋光鼐先生休闲的时间。按理说，此事在我平时看来并不困难，因为在美院学的就是油画专业，受五年本科的训练。但是面对这位前辈，从过去国中的一员名将到而今的国家部长，心情总有点紧张不安，就像一个小学生面临一场考试。但是他那安详、慈蔼和善良温静的神情，使我很快镇定下来，心神凝注于画面，一个上午，画面上渐渐地呈现出我所敬仰又熟悉的光鼐先生的形象。可惜的是后因光鼐先生太忙，我又得在有限假期结束前赶回青海，这幅肖像中的衣服下部，还没最后画完整。不料此后不久，举国开始了一场政治运动，其浪潮一浪高似一浪地又向我们冲击而来。接着光鼐先生也罹病无治而谢世。我再也没能够见到他老人家，将未完的肖像真正画完。想起来，一直是件大憾事。惟有弥足珍贵的是我在向他告别之前，赠我三枚石章，都是如玉般晶莹润透质地极佳的上品，有两方带小锦盒的尤为可人，我便放在唯一的箱篋中。谁知不久动乱之中，我在青海的陋室被窃，除完好衣物外，书画未失，但深藏箱中的二石不翼而飞，在那个年月，自保犹难，更何处去申说？所幸者尚有放在案上的一方长形白如羊脂的石章竟免此一劫。我思忖再三，一剖为二，其一自留，另一则为建国兄刻一名章还赠，以作纪念。如今一晃已是三十余载，我依然记得，最可把玩的是那一块偏遭窃去的，色如鲜肝冻石而温润沉着，有着诱眼光泽的石章。

20世纪终于变成历史的一页翻过去了。在21世纪新春来临之时，建国又命我写些有关光鼐先生的回忆性的短文，而且着重谈谈光鼐先生的书法。这提醒并激起我久蕴的一个思绪。1992年初春，建国邀我同去瞻仰光鼐先生的在故里——广东东莞虎门镇南栅乡的故居。那是蒋家的一个旧宅，在许多荔枝树的浓翠的掩映下，显得简朴而庄重，展出光鼐先生的生平事迹后，依然不失原貌，不论在庭院或陈列室，我都感到既有岁月流程的历史氛围，又有昔时居家的生活气息。所有的陈列，都突现了光鼐先生一生光辉的业绩，从做一个士兵起，就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而脚踏实地立志献身，一步步地成为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在革命关头和民族危亡之际，浴血奋战，指挥若定、运筹帷幄，在淞沪一战中，给世人永远留下不可磨灭的功名。但其中令我更加敬佩和难忘的是许多手书墨迹，大部分是书信来往和简笺，有长有短。我是个书法迷，当为之动心注目。每每驻足细览欣赏之下，真难相信这些挺秀流畅而又具刚健遒劲的字，竟出于一位长期军旅生涯的武将。这不禁使我想起历史上的许多儒将：自晋代的王右军、宋朝的岳飞、清末的林则徐，直至如今已故的朱德、陈毅、叶剑英等将帅，

都以墨迹传诸于世。光鼐先生的字在咫尺的素笺上，不论大小或工细，皆系军中公务繁急之刻，信手写来的行书，疾速处多见甚使转绵连的挥运，一派自然、超逸、洒脱之气，全无剑拔弩张荒率的粗态，况行文亦文白相间，简洁达意。可以肯定地说，光鼐先生自幼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在文墨上下过很大工夫，无论法帖碑版，必熟谙而心悟，而且始终握管濡墨挥毫于笺，即使军务在身，来往信札，亦从不懈怠，遂给我们留下如此点画有致运转自如的宝贵翰墨。虽有一手好字，光鼐先生从未自引为书法家，仅认为此乃中国民族文化之衣钵，习之得之用之，皆属理应。反顾时下，上上下下许多人了无传统文化修养，也少书法必要基础，未下什么功夫，便提起毛笔，敢自称为书法家，甚而招摇惑众，悬之于展厅大堂，付梓于集，得利于市。书坛风气由此混浊不清。如果对照光鼐先生清俊儒雅悦目赏心的手迹，能不自惭乎？高仰前辈，其业绩、品格、学识、风骨，足为后人之鉴。如若大家都能循师力行，那么，前辈毕生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日新的努力奋斗，才没有白费心血。

二〇〇一年三月阳春撰于悟未斋西窗

朱乃正，著名书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